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读《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有感

一、鸿沟之外的阶层列车

惊觉那些已经埋进故纸堆里的关于翻盖手机、小灵通、公用电话的记忆，才发生在十几年前。

2008 年前后，我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身份，和父母一起在上海生活。那时，父亲使用的是翻盖的小灵通，点击左侧的按键，就会有：已开始上网浏览的语音提示。我有时会偷偷用那部手机玩小游戏，月末的时候，母亲抱怨这个月的话费高得出奇，索性去移动营业厅注销了手机的上网业务，而我只能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初中的时候，是刚刚触网的微甜记忆，千挑万选的 QQ 空间装扮，烂熟于心的暗恋男孩的 QQ 号，以及拷贝进 U 盘里的青涩情歌。那时，家里的电脑还没有安装宽带，最期待的是每周一次的计算机课，或者去同学家上网。如今想想，那时的依依不舍和艳羡，大概就是具象意义的“数字鸿沟”了。

上大学之前，我对于网络的认知都是疏远而模糊的，上网被家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的禁忌。而当下，离开互联网的生活已然不可想象，但技术，始终不是“平”的。

前些年回家，和父母一起乘坐地铁，他们扫健康码的时候，手机因为卡顿，迟迟没有反应，我就站在地铁安检的另一侧等待。原来这些年，不是我们追赶上了技术，而是技术席卷了我们，那鸿沟，是一

直都在的，就藏在不断更迭的硬件设备和眼花缭乱的应用程序里。前者帮助我们“节约”时间，使得数据的运转得以秒为单位，滞后意味着淘汰、尴尬、不体面，而后者则千方百计挥霍我们的时间，枯燥和空白变得不可忍受。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被技术所使用。

而在技术鸿沟背后，是关于阶层的隐喻，我们一直攀爬却始终跟不上的，是一班属于更高阶层群体的列车。手机屏幕摔得斑驳、系统严重卡顿，却仍然舍不得更换，往往不是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支付不起”，而是人们有其他的“生存性传播需求”，背后又牵连出一整套的价值排序和身份认同，比如为什么要花几千元购置一张餐桌，只是为了家里来人时，显得更体面？却不用这笔钱，去更换一部随时随地会使用的手机？

二、技术背后的无常命运

阅读邱林川，扑面而来的是人文关怀与理想主义。不同于诗人的悬浮，那是一种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坚韧的浪漫，一如他在传播学大会上的发言：“追求解放、平等、互相尊重的传播研究，反对依赖暴力、强权乃至霸权的传播学。”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一书首次出版于 2013 年 9 月，书本的论述主体，距今已有些年代感。扉页是醒目的三行字：谨以此书献给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殇职业病工友，而后是卡斯特作的序，题为“这个残酷的、充满剥削与排斥的信息时代”，像是一锤一锤在人心上凿了个洞似的钝痛。

（一）上编：网络之普及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网络之普及”，讨论网络 and 手机如何在信息中下阶层中扩散。

章节以网吧为落点，提出：有关部门以保护青少年为名，出于政治、经济的考量打压网吧，致使网吧在教育、信息、文化、社会表达方面的功能无法发挥，而堕入单向的娱乐化。在更深的层次上，这是精英阶层对基层民众共享的公共空间的污名化，是对其信息、娱乐和社交需求的漠视。

我小时候只去过一次网吧，还是在父母的陪同下，去填写资料。初中的时候，班里的男孩会相约去黑网吧打游戏，我觉得新奇，却也只是听听而已。父母和老师说，去网吧的都是坏学生，这种标签也贴在 KTV、酒吧、游戏厅等地方，时至今日，我都很少涉足。一个地方为何是坏的，何种需求是坏的，我以前不曾思考过这些问题，只觉得，诸事天然都有准则，要“学好”，不要“学坏”，要规避风险。而回顾网吧沉浮的整个脉络，始知“话语即权力”，一些习以为常却又禁不住推敲的叙事，原来这样深刻地规定了我们的“常识”。而金钱和权力正如《寄生虫》的台词里所说，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熨斗，能抚平生活的一切褶皱”，让某些需求显得光明、正当且体面，也让另一些相形见绌，难登大雅之堂。否则，为什么去网吧使用电脑是不好的，而在家里使用最新配置的电脑就是光鲜亮丽的？贫穷是否总与邪恶、懒惰、愚昧、黑暗、丑陋相连？

与整治网吧不同的是，关于手机的扩散及其服务的规范化，牵扯出另一个面向：既得利益者在体制中的位置。技术背后的规则是“平”的吗？邱林川给出的答案是：社会地位越低，收入越少，往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这是一个被公平正义的口号和日益提升的生活水平遮蔽的常识。和长辈谈话的时候，他们常挂在嘴边的是对权力和财富的青睐，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觉得他们庸俗，却又在某天发现，政治经济要素原是无孔不入地渗透乃至编织了我们摇摇欲坠的生活。

如今，随着平台组织的兴盛和平台化的演进，对资本的批判在学术论文、媒体报道、网友评论中随处可见。但是避而不谈却又随处可见的，还有与资本交织的特权。商业运作如何与传统社会的权力系统合谋，从而成为精英阶层操控中下阶层的工具，是一个值得用经验和思考持续填充的框架。无数被政策鼓励或默许的、由平台操作的 AI 删帖，都藏着沉默的真相。抽象和宏大容易失真，只有渺小而微弱的叹息永存。

（二）中编：信息中下阶层

与“数字鸿沟”描绘的两级分化的世界不同，“信息中下阶层”的概念让介于信息拥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人群浮现出来。作者主要聚焦流动者和“老与少”两大类群体，进而探讨传播扩散与赋权、流动者群体的内部差异、医疗教育体制改革等问题。

文章将中低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归因于中下阶层的传播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这让人想起快手如何在乡镇异军突起。低门槛的短

视频挑战了以文字为中心的媒介叙事，让更多缺乏传播技能的边缘人群得以发声。但是，粗糙的草根短视频难以被主流接纳，往往需要通过猎奇、土味来博人眼球，至此，短视频已无法表达传者的真实诉求。另一方面，这种剑走偏锋的传播方式又加剧了舆论对短视频这一载体的审视乃至批判。这意味着，时至今日，纵然人人都有手机，都有所谓“记录美好生活”的权利，但是，信息中下阶层的需求仍旧是被忽视的，并最终被规训、扭曲和重塑。

我想起自己对于短视频，始终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来自于大众传媒和传统教育，比如，阅读总是高雅的，哪怕读的只是通俗小说，但短视频却往往与沉迷、娱乐、低素质等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一种载体天然比另一种要高雅；为什么口语转换为文字，便显得更有价值？是因为文字的创作更加审慎，还是因为掌握这种技能的“少数”需要维护自身不可撼动的权威，从而巩固布迪厄所说的品味区隔？

而在阶层之外，流动者还有收入、性别、学历、民族和地区等的差异。如果沿用一切矛盾都是阶级矛盾的视角，确乎会遗漏一些细节。比如，处于同一阶层的女性相较于男性，拥有更少的工作机会和更低的收入水平，甚至被诱惑着从事软色情行业；同样贫穷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于汉族，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更加糟糕，并且在接受媒介资讯方面存在语言障碍……

每一个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一定程度上定位和掣肘了个体生存、发展的状况，而其中最能将分散的个体联结起来的当属亲缘、地缘关系。中低端的信息传播技术，比如短信、QQ 等使得亲友、同乡得以联结，

并找到离家后的第一份工作，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决策。这弥补同时也显示了传统媒体在就业信息供给方面的匮乏。此外，地域的流动并不一定能带来阶层的流动和偏见的消除，换言之，正是因为这些外来群体难以被大城市接纳，所以更加需要抱团取暖。而这种对熟人社会的高度依赖，在当下的数字劳工群体中仍然具有普遍性。求职APP更高的门槛、复杂的步骤、对学历的要求，以及弥散的不信任感，都会成为隐形的求职阻力，促进城市融入和消除群体区隔，更是任重而道远。

除去青壮年劳动力，流动性更弱、依附性更强的老少群体，也同样依赖通讯技术来解决生存、社交和娱乐的需求。越是社会服务缺失的地区，个体就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疫情期间，一些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使用健康码；部分学生的通讯条件落后，无法正常上网课等，都折射出被技术抛下的人们所需承担的代价。科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将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责转嫁给了个人。比如，原本只是交管部门或者学校需要安装通讯设备，如今，个体需要承担相关费用，而这种个体化的责任转移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正是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

此前，我一直特别喜欢心理学和新闻故事，排斥过分强调出人头地的人生指南和精准但无趣的数据模型，但是随着年岁渐长、流泪过多，忽觉向内求索的心理学，将人世一切不合理之处，都归咎于个人的欲望和失调，而有了佛道的色彩，可以救一人，却无法渡众生；而

泛滥的情感叙事则遮蔽了结构性的残忍和剥夺，并失去真正能够改变的力量。

（三）下编：新工人阶级之雏形

下编从生存之地和生死之时两个维度刻画了工人的现状，他们在工业区工作，在城中村居住，试图通过集体行动和社区协作重建生活，但是日常的矛盾也可能会演变为恶性事件，中下阶层用死亡作为最后的反击，来控诉不公、压迫和绝望。

十年过去了，中下阶层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从全社会来看，阶层固化愈加严重，贫富差距更为悬殊。更严格的媒体监管和泛娱乐化的生态，使得死亡变得更轻，公众的同情和愤怒逐渐转向迟钝和冷漠。另一方面，随着主流媒体的发声空间愈小、公信力丧失、社会撕裂加剧，追问社会根源的官方声音越来越微弱。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更好的还是更糟糕的时代呢？

孙立平指出，当下的中国处于断裂时代，其实质就是多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且彼此之间缺乏有机整合^①。这种断裂在个人心理层面表现为观念冲突和心态失衡，在社会环境方面则体现为阶层对立和运行失序。

如今的舆论场，各种思潮潜流涌动，纵观整个社会，更是乱象横生。改变的关键仍然在于，如何将个人命运与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相勾

^① 郭于华：《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孙立平“社会断裂三部曲”的社会学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连，看到道德之外的困境，困境背后的阶层矛盾和社会结构，而这也是中下阶层联结的力量，即：对抗共同的不公正的命运。

回顾 2022 年，唐山打人事件的监控视频最初由微博网友发布，后续有更多的网络爆料线索浮出水面，警方在侦查中揭开了黑社会江湖的一角。河南郑州富士康的工人徒步回家，视频借助抖音迅速扩散，沿途的居民在路边留下物资供返乡人员自取。新疆乌鲁木齐大火，更引发了居民、学生针对不合理封控的集体行动，这让地方不得不重新考量权力的尺度……

我们依然在这些事件中，看到普通人的挣扎和新媒体的力量，看到追求公平正义的朴素愿望，我们希望国家和政府能给出回答。

三、在悲观中前行

新媒体有时是下层协同的工具，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精英维稳和传输意识形态的利器。大数据时代，新工人阶级的协同与反抗，早在萌芽之初就被监控、消解。而与被压抑的反抗相伴而生的，是犬儒主义式的回避，和消费主义驱使的慕富慕权。一方面，人们追求编制的安稳，不再相信阶层跃迁的神话，却围绕考公考编陷入新一轮的踩踏式竞争；另一方面，生在罗马的权贵备受推崇，底层的奋斗叙事被认为始终摆脱不了寒酸气息。

这大概是上升通道逐渐关闭时，群体挣扎的又一个面向：无法向上的行者想把邻近的攀登者拽下来，却又对身居高位者顶礼膜拜，以寻求一种微弱的心理平衡：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种沉重的宿

命感，像是坠回某个古老年代，需要有人大喊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禁要叩问，是怎样的土壤催生了犬儒和慕权两种看似截然相反、却又一体两面的思潮？或许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所致的求而不得。

随着躺平和佛系成为流行语，“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叙事开始打折。一条新闻说“北京骑手小哥一年跑2万单年入20万”，人们开始提出质疑：不要鼓吹加班和过度劳动，剥削和自我剥削不可取。这可是北京骑手里的第一，年薪20万在北京算多？他得骑多少年才能在北京买房？权贵不用吃苦，一天挣的钱也许是他一年的好几倍。

如果8小时的工作不能满足个体住房、医疗、教育的需求，只有依靠超额劳动才能应付生存支出，自由和尊严从何说起？如果单位时间内不同群体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实体的繁重劳动不断贬值，虚拟的经济泡沫却坐拥渔翁之利，多劳多得、勤劳苦干、公平正义如何能有说服力？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问题藏在被删除的文章和话题背后，他们被禁止言说。

当下最流行的话语当属心理学和情感，因而它们安全，它们要求个体反求诸己，而非质疑周遭，于是，所有的不满都在接纳中消解。以家庭为例，当下亲子关系的核心矛盾是应试教育，可是应试教育的核心是有限的教育资源、社会资源与巨大的人口基数之间的矛盾，所以一种被认为公正的方式是：根据学历来分配机会。虽然这种分配机制已经趋于失效，却也是为数不多的可能的上升通道。换言之，有学历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是对于寒门子弟而言，缺少这一筹码，却是雪上加霜。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心理学的叙事下，成为了一个亲子矛盾，

而其导向是：不要逼迫孩子学习。可是，然后呢？心理学给不出答案，推行中考分流、双减政策的教育改革也没有给出答案。

又是一年国考，约 70 人录取一人，以前人说下海，现代人追求上岸。我常觉得，苦海无边，无岸可上。

重新听了国际歌，评论区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之所以纪念苏联，是因为人类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所有普通大众而存在的理想国度。还有一句是：有人读书是为了成人上人，还有人读书是为了世上再没有人上人。

我感到汗颜，为自己那一点微不足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以及被嵌套进无穷诱惑里的孱弱人生。